



我的祖国，是一条冲天腾飞的东方巨龙，是一头威风凛凛的雄狮，是一只昂首高亢的雄鸡，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。

每当谈起我的祖国，我心里便会感到十分骄傲和自豪，因为，伟大祖国使我们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，且听我的倾诉。

1941年，我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西加里曼丹一个美丽的小村庄，祖籍是曾被誉称为“足球之乡”的广东省梅县。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及爱国思想的熏陶和濡染，家乡的情结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悄然萌发、潜移默化，总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。

就在我18岁那年，机会终于等来了：一方面，由于印尼政府的排华政策，不少华侨千里迢迢回归故里；另一方面，祖国也召唤海外有志青年回国参加建设。于是，我怀揣一腔报国之心，背起行囊，毅然决然地告别了父母回到祖国怀抱，投身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。当然，回国的途中并不一帆风顺，我和同伴们历尽艰辛，几经周折，最终来到了厦门市同安区的竹坝华侨农场。

1960年，祖国大陆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，物资匮乏，供应紧张，比起在印尼时的生活条件自然是差得远，但我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怨言，也不曾后悔过。因为我心明白：国家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，而困难不正可以考验和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与毅力吗？就这样，我和大伙同甘共苦，过着“瓜菜代”的困难日子。

到了同安竹坝华侨农场后，我最关心的是怎样让归侨子女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，当时的农场也正准备筹办学校，师资却十分紧缺。于是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师这个为人师表的职业，报考厦门师范。毕业后回到竹坝小学工作，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教书生涯。那时，学校的教学环境与条件非常原始简陋。课堂是在养过猪的猪舍里，课桌和椅子都是用木板架在泥土地上。有时，台风一刮，屋顶的瓦片被吹走了，师生们便要戴着斗笠上课。那情那景，真是不堪回首啊！然而，我没有畏难，也没有退却，更没有向困难低头，而是以更加饱满的精气神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，而且一干就是50多个年头。



登上了半个世纪的体育课

73岁的温文彬是印尼归国华侨。1960年，他回到中国，在福建厦门同安县的一个大山中做了一名小学体育老师。

## 农村体育教育是我毕生的事业

□ 温文彬口述 吴兹扬整理

地做好本职工作，报效祖国的工作热情依然未减，而且更执着，更敬业、更勤恳地投入体育教育工作。

多年前，由于体制原因，竹坝学校女子排球队无法与区级、市级的学校同台竞技，切磋交流，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，最终得到厦门市体委主任的支持，通过沟通，终于拿到参加比赛的人场券。从那时起，这支被称为“娃娃队”的“赤脚”球队，靠自己脚踏实地和顽强拼搏的作风，一步一步地走向理想的殿堂。可她们的每一次成功，都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，要比别人流下更多的汗水。特别是对这样一所普通的农村学校，本来教学设施就非常简陋，哪来的训练场所和器材呢？全靠大家想办法，因地制宜、自力更生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，这就是竹坝人的精神！

这支女子排球队把凹凸不平的泥土地开辟作排球场，在泥土上摸爬滚打，渴了就喝口凉水，累了只稍歇片刻，坚持、刻苦、顽强，是她们可贵的品质。球队刚组建时，只有一粒排球，而且还是从体院“退役”下来的，球网也是我用渔网的线自己编织的，在球网上面还设置一个软塑料管套在钢管上，以免在扣球时触到钢管上伤了手，且又能使球网更坚实、牢固、耐用。她们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，直到取得让人刮目相看的“十连冠”佳绩。

2013年11月，妻子过世后，我经常失眠，有时因思妻直到三四点也睡不着。近年来，岁月不饶人。我患有“三高”问题，要靠药物控制，每周都要上医院拿药。我一生没有孩子，已经习惯于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。学生们也亲昵地称呼我为“爷爷”教练。

有一年暑假期间，竹坝学校女子排球队先后参加省运会排球赛以及省中学生排球联赛，集训的工作又提上了议程，每日上午8点到11点，下午2点到6点，三、四十名队员总会准时出现在排球场上。随着多数学生放假回家，学校的食堂也放假休息，为了保证学生的饮食健康，我既当起了学生的教练，又扮演起保姆的角色。每天早上7点多，为留宿学校的学生准备早点——泡好咖啡、麦片，准备好饼干。而中午在学校吃饭的球员多达80多人，为此，两三天一次，我从学校赶到10多公里外的城区市场买菜买肉，再从城区折回学校。每天集训结束后，又急忙到食堂洗菜、切菜、做饭。在我的带动和示范下，一些没有下过厨房的学生也慢慢学会如何切菜煮饭，学生们都喜欢来到这里吃饭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随意。

为了节省学校的体育经费，我保持着简朴的作风，不仅教学生体育，常教导学生懂得感恩也要勤俭，我带学生外出参加比赛，除了带回奖状也会带回一大袋的矿泉水瓶，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，再把这些空瓶卖出去，换钱用来买球员需要的体育用品。我觉得做自己喜欢做的体育教

育工作是幸福和快乐的，我要像蜡烛一样，要继续发热、发光，燃烧到尽头，多为竹坝培养一些体育人才，让他们走出竹坝，可以与城市院校的孩子公平竞争。

几十年如一日，我为学校所做的这一切，为同安区乃至厦门市体育事业所付出的一切，虽然是平凡的工作，但领导和老师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我很荣幸受到上级的肯定，荣获“全国农村优秀体育教师”“福建省优秀教师”和全国“筑德奖”等称号，电视台、报社等媒体也曾相继报道我的事迹。一面面锦旗、一本本荣誉证书、一个个冠军奖杯，验证了我多年追求的信念：“让农村的孩子与城里的孩子一样德智体全面发展。”

在竹坝学校，体育运动已经是一种校园文化。群众性体育运动在竹坝蔚然成风，每年班级、年段、学校都开展“五球比赛”（排球、足球、篮球、乒乓球、羽毛球），小型多样化的比赛让人人都有机会参与。

这其中也有我的一份汗水，这是我要对我们祖国母亲七十周年华诞说的话。让我们共同祝福母亲生日快乐，祝愿我们的祖国未来更美好。

（厦门市印联会供稿）



获一九八四年厦门小学基层排球赛冠军留念

有些人也许不知道，竹坝小学是归侨子弟学校，学生来自东南亚不同国家，语言不通造成了教学与交流的很大障碍，而对从小就讲客家话的我更是面临着严峻考验。为了攻破这一语言关，我努力学习普通话，并虚心请教，积极钻研业务，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短短的时间里，不但提高了业务能力，也能讲一口较为标准的普通话。不仅课上得生动活泼，还学会了吹、拉、

弹、唱，成为教学多面手。我除了教语文，还兼体育课，1972年，我转为正式的体育专职教师，承担3个年段、8至9个班级的体育课。无论是上课，还是课余时间，我经常和学生一起打球，一起游戏，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和亲密无间的兄长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由于海外关系的缘故，我也多多少少受到一些不公的非议，入团问题被耽误了好几年。尽管如此，我一如既往



的理華奇農場教廈門市首屆女子足球賽冠軍合影

